

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王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二战后, 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 战败的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 民主德国起初坚持了“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政策。但由于两德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 两德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20世纪70年代初, 昂纳克政府开始提出并践行“两个民族两个德国”政策, 民主德国由此彻底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然而, 该政策并没有实现维持国家稳定的目标, 究其原因在于民主德国自身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民族政策; 失败原因; 德国统一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7)03-0018-08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7.03.003

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 两个德国都曾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付出过努力。与联邦德国始终奉行“一个民族”和“民族统一”政策不同, 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和德国政策经历了由“一个民族一个德国”到“两个民族两个德国”的转变。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转变与其在德国政策上的调整紧密相连。然而, 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只是给他带来暂时性的稳定, 德意志民族问题依旧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 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印证了这一点。因此, 对战后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 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探究民主德国消亡的原因。本文拟通过具体考察战后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 进而揭示导致该政策最终失败的三大因素。

一、战后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

(一) 从“一个民族一个德国”到“一个民族两个德国”

二战后, 德国的分裂是其纳粹政权发动第二次

世界大战失败的结果, 也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产物。受冷战的直接影响, 德国西、东占区在美苏的扶持下逐步演化为两个德意志国家。为了克服这种人为的分裂, 两德在建国之初就将完成祖国统一作为主要任务。1949年5月, 联邦德国公布了一部过渡性宪法——《基本法》, 在其序言中这样写道: “……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 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①。随后, 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其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 “联邦政府的最高目标就是以和平自由的方式完成国家的重新统一。”^②

民主德国成立后, 德国人民委员会随即宣布成立全国阵线的目的, 其中就包括统一德国。^③ 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在施政纲领中强调, 工农国家政权将坚定不移地为和平, 为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而奋斗。^④ 此外, 民主德国在其首部宪法中也加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规定——“德国是由德国各州组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 ……只存在一个德国国籍。”^⑤ 显然, 民主德国的这部宪法是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撰写的, 并不仅限于在苏占区单独成立

【作者简介】王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研究(1949-1990)”(16CSS029)阶段成果。

① Ingo von Münch (Hrsg.), *Dokumen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Bd. 1,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1976, p. 91.

② Klaus von Beyme (Hrsg.), *Die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von Adenauer bis Schmidt*, München: Carl Hanser, 1979, p. 53.

③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宣言》, 世界知识社辑《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文件汇编(第一集)》,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版, 第134页。

④ Ernst Diehl,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Abriss*, Berlin: Dietz, 1978, pp. 219~220.

⑤ Rudolf Schuster, Werner Liebing (Hrsg.), *Deutsche Verfassungen*, 13. Aufl., München: W. Goldmann, 1981, p. 189, 212.

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高举民族统一的旗帜迎合了德意志人民要求重新统一的愿望。他试图动员在德国东西部所有的民族力量，以实现民族国家重新统一的梦想。然而，由于两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民主德国尽管为争取民族统一做出过不懈努力，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面对联邦德国坚决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成为民主德国政府的基本任务。与此同时，德国统一社会党还把向劳动人民解释民族问题的社会内容视为首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此，他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阶级问题，须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①

尽管如此，民主德国这一时期奉行的仍是“一个民族一个德国”政策。在其看来，两德国民皆属于同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只是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1954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讲道“我们赞成一个统一的德国，因为在我们祖国西部的德国人是我们的同胞，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知道，恢复德国统一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②

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冷战进入全面对抗状态以及两德先后加入相互对立的西方阵营，德国统一问题逐渐陷入僵局之中。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进行渗透，吸引其公民大量出逃。民主德国的安全稳定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直到1961年8月，民主德国通过修建“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员的外逃。“柏林墙”建立后，统一社会党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防止本国被联邦德国并吞，逐步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

1967年，民主德国政府将“全德问题秘书处”

更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随后又颁布了《民主德国国籍法》。同时，民主德国极力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1968年4月，民主德国放弃了1949年以“全德”为基础的宪法，开始在新宪法的第1条将自己称为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把宪法内容范围缩小到只适用于本国。显然，民主德国已经放弃了作为全德核心的要求，通过建立自己的国家，来替代过去的法定国家，并以此作为其“两个德国”的分裂主义政策的基石。

此外，从1964年12月开始，民主德国还对来自西方国家的访问者实行最低兑换额制度^④，以减少西方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对其公民的影响。1968年6月，民主德国提高了最低兑换额度，由原来的每天5马克升为10马克。^⑤对于联邦德国公民而言，这一规定增加了他们到民主德国探亲访友的经济负担，迫使一部分人放弃了访问计划。此后，该政策成为民主德国贯彻分裂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两德人员正常交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二）“两个民族两个德国”政策的提出与实践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益缓和以及美苏对德国分裂现状的默认，联邦德国政府被迫在德国政策上改弦易张。1969年9月，社民党人勃兰特当选总理后，开始全面施行“以接近求转变”的政策。勃兰特政府认为，“当前现实的政策目标在于克服两德间的僵化关系，以维护民族的统一。……但须强调两德不互为外国，双方的关系是德意志内部的特殊关系。”^⑥此外，勃兰特政府始终坚持“一个民族”和“文化民族”的提法。1970年1月，勃兰特在《德意志民族状况报告》中讲道“‘民族’的含义和内容更多地是指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而非国家和社会制度。民族是

① Ernst Diehl,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Abriss, p. 232.

② 世界知识社编《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纪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11~212页。

③ Rudolf Schuster, Werner Liebing (Hrsg.), Deutsche Verfassungen, p. 243.

④ 在民主德国境内的外国访问者被要求每天必须按照1联邦马克兑换1民主德国马克的汇率，兑换一定数量的民主德国马克。两种货币币值相差很大，联邦德国马克更值钱。

⑤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2,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68, p. 175.

⑥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4,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70, pp. 11~12.

建立在民族成员持久的民族归属感的基础之上的。”^①弗兰克部长在一次年会中也谈到,“在德国,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是不可分割的。……两德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意志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重要支撑。”^②

20世纪70年代初,在东西方大气候进一步缓和的带动下,两德关系开始解冻。特别是《两德基础条约》签订后,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以及人员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增多。民主德国担心联邦德国的“接触”政策及其民族政策会对国家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于是便开始进一步削弱本国公民的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这一时期,除继续坚称两德已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国家外,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民族”的主张。

1970年1月,乌布利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驳斥了勃兰特的民族理论。他说,“当前,勃兰特之所以以一种神秘方式谈论民族统一,是因为他需要这一虚幻主张以避免同民主德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国际法上的关系。”^③同年12月,在统一社会党25周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乌布利希又进一步讲道“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早已消亡。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过程。”^④

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后,继续贯彻前任的“划界”政策。他强调,“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势力把宝押在一些历史因素上,如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在旧德国形成的千丝万缕的亲戚联系,妄想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里正在形成着社会主义民族。”^⑤

显然,民主德国政府的“两个民族”主张是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它将民族概念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化,以阶级斗争代替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共

同体。其目的是通过培养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彻底切断连接两个德国间的政治和民族纽带,进而维护和巩固民主德国的主权独立。可以说,民主德国政府的“两个民族”主张进一步强化了其“两个德国”政策。民主德国也由此彻底滑向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深渊。

与此同时,昂纳克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政策。除继续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之外,其主要措施还包括彻底放弃民族统一旗帜,不断在两德人员交往方面设置障碍,以及培养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1974年10月,民主德国开始以修改宪法的形式,勾销了1968年宪法中有关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统一的提法。例如,1974年宪法第1条不再宣称民主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称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第8条删除了克服德意志分裂状态以及逐步实现德国统一的相关内容;第6条则更加突出强调,“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⑥显然,这种大家庭内部的忠诚通过正式文件排斥了全德意志的民族忠诚。这部宪法实际上是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分裂以法律形式予以了肯定。不过,民主德国虽在宪法中取消了“德国国家”这一概念,但无法抹掉她的德意志身份。

在限制两德人员交往方面,民主德国继续使用提高最低兑换额的策略。1973年11月,民主德国第三次提高最低兑换额度。按照规定,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柏林的访问者在东柏林每天须兑换10马克,在其他地区每天须兑换20马克,不满16周岁的来访者可免除兑换义务。^⑦1980年10月,最低兑换额度再次上调。在民主德国境内,来访者每天的最低兑换额统一上调至25马克,领取养老金者也不例外。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则须兑换7.5马克。民主德国的这一举措对两德间的人员往来影响很大。在其实施后的两个月间,来自联邦德国和

① Ibid., p. 203.

②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6,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71, pp. 247 ~ 248.

③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4, pp. 261 ~ 262.

④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6, p. 291.

⑤ [德]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龚荷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⑥ Rudolf Schuster, Werner Liebing (Hrsg.), Deutsche Verfassungen, pp. 218 ~ 219.

⑦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Bd. 1,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75, p. 286.

西柏林的旅行者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和60%。^①

在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方面，民主德国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上。自昂纳克上台以来，统一社会党大力施行“经济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这是一项广泛的社会政策纲领。国家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扩大住房建筑；稳定消费物价、公用事业费和房租；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用于疗养、文化和体育事业。^②昂纳克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政策能够借助民主德国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水平，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德国尽管维持着暂时的稳定，但他并没有解决战后长期存在的德意志民族问题。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剧变，民主德国的形势随后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国内局势开始失控。最终，内忧外困的民主德国被迫放弃了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德意志民族随后再次实现了统一。

二、民主德国民族政策失败的原因

（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

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两个德意志国家一直互为镜像。由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联邦德国，导致民主德国在争夺民族统一主导权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了避免被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整体利益，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但其最终没有逃脱消亡的命运。这些与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有着密切联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在人口、面积、经济结构以及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资源等方面存有明显的劣势，致使其先天不足。民主德国成立后在经济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导致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失调。在民主德国，每一个零部件生产多少，都是有定额的，超过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不是按市

场要求生产。^③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民主德国公民大量出逃至联邦德国。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给民主德国带来了严重问题。

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给民主德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通过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在随后几年里取得了较快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但与联邦德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197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商品出口额排名世界第二，黄金储备高居世界第一。^④就生活水平而言，民主德国在60年代是苏东阵营最高的国家，但其60年代末的水平与联邦德国6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⑤由于这种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对比的不平衡，使得民主德国政府担心两德间过多的接触和交往会威胁自身的稳定。于是，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试图以此瓦解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认同意识，并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培养新的、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抵制来自联邦德国的影响。

70年代初，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民主德国希望藉此增强国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对外彰显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形成有力竞争，尽可能地抵制因两德间交往对国家稳定带来的种种挑战，尤其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对本国公民的吸引力，进而支撑其“两个民族两个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

不过，由于当时世界主要原料价格和商品价格不断攀升，民主德国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又大部分高度依赖进口，在缺乏科技创新的情况下，民众的收入是有所提高了，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却明显不足。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不仅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还造成民主德国财政困难，债务状况日益恶化。

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民主德国

①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Die Entwick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 Republik 1980 - 1986: Eine Dokumentation, Bonn, 1986, p. 8.

② [德] 埃里希·昂纳克 《我的经历》，龚荷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18页。

③ 徐鹏堂编 《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④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 《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

⑤ [德] 卡尔·哈达赫 《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扬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2页。

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西方债务不断增加,致使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出于对民主德国偿还能力的担忧,西方国家关闭了向其发放新贷款的大门。此时的苏联鉴于其自身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对其提供有效的帮助。民主德国借贷无门,只好转向联邦德国请求帮助。最终,民主德国通过放松对两德人员交往的限制,换取了联邦德国近20亿马克的贷款,暂时延缓了债务危机的升级。到了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两德经济水平的差距更为凸显。1989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1829马克,联邦德国则是35856马克,民主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联邦德国的33%。^①

1989年9月,当匈牙利宣布开放西部边境后,民主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和示威潮,致使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虽然克伦茨上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仍没有抑制民主德国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在经济领域,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性积累率下降,不能完成预定计划目标。生产设施的损耗程度严重。^②在生活领域,存在着隐性的物价上涨,价格低廉的商品越来越经常地从货架上消失。^③由于经济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改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在南部一些经济较差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1990年初,这些地区的民众在游行示威时常常打出这样的标语“西德马克过来,我们就留下来;西德马克不过来,我们就到那边去!”^④

面对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民主德国莫德罗政府开始寄希望于联邦德国的支持。为了换取科尔政府的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不得不放弃之前奉行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转而表示赞同逐步实现德国的统一。此时,民主德国政府不再通过实施改革来应对经济困境,稳定社会秩序,而是期望通过实现德国统一来化解当前社会危机。最终,民主德国以并入

联邦德国的方式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

(二) 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

与民主德国不同,联邦德国自建立伊始,就始终不渝地奉行“一个民族”和“民族统一”政策。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以及随后美苏关系的日趋缓和,使联盟党阿登纳政府“以对抗求统一”的政策走入死胡同。此时,在野的社民党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统一问题。1963年7月,社民党人埃贡·巴尔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以接近求转变”以及“小步子策略”。其核心思想是:在东西方关系以及两德关系上,通过加强对话接触,促进相互了解,打破双方长期僵持的局面,进一步推动欧洲的缓和与和解进程,从而“打开通向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道。”^⑤

1969年,社民党人勃兰特领导的联邦政府对民主德国开始大力推行“以接近求转变”的接触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80年代末期。在此期间,联邦德国注重利用各种经济杠杆来密切两德关系,换取民主德国在两德人员交往方面的让步,以此来维系日益疏远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意识,抑制民主德国划界政策产生的消极影响,为日后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创造有利的内部条件。

自战后德国分裂以来,德国内部贸易一直被联邦德国视为国内贸易,同时作为链接两德的经济纽带。他也是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尔部长曾这样讲道“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合作组织,但其相互间具有特殊的贸易体制。……在处理双方基本关系时,像贸易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不能缺少的。……对此,联邦政府无意做出改变,也不允许改变,因为它对于民族利益而言非常重要”^⑥。

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发展德国内部贸易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德国内部贸易通常占联邦德国外贸总额的2%左右,而占民主国外贸总额的比

① 姚先国, [德] 海因茨·缪尔德斯 《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② [德] 克里斯塔·卢夫特 《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与回顾》,朱章才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③ [德] 埃贡·克伦茨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沈隆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④ [德] 克里斯塔·卢夫特 《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与回顾》,朱章才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⑤ Willy Brandt, *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 - 197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8, p. 27.

⑥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Bd. 12, Bonn: Deutscher Bundes - Verlag, 1973, p. 291.

例约为10%。^①为了缓和两德关系，改善两德人员往来，联邦政府甘愿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例如：在德国内部贸易中，民主德国单方面享受联邦德国对其免关税、免出口附加税、享有欧盟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措施。此外，为了促进德国内部贸易的发展，联邦德国还在该贸易框架内引入了无息透支贷款。民主德国经常把他当作一个长期贷款来使用，这样可以为其省去大笔贷款利息。

由于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联邦德国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杠杆，促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两德人员交往的限制。例如，1974年，联邦政府通过延长无息透支贷款协定和提高无息透支贷款额度的方式，令民主德国免除了联邦德国养老金领取者的强制兑换义务。额外经济负担的去除无疑会提高他们赴民主德国探亲访友以及旅行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了两德间的人员交往。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尽快消除欧洲中导危机对两德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改善两德间的人员交往与过境旅游交通，联盟党科尔政府先后向深陷外债危机的民主德国提供了两笔担保贷款，总额近20亿联邦马克。之后，民主德国也相应地作出了一些回报——免除联邦德国部分青少年的最低兑换义务；降低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最低兑换额；延长来访者的停留时限等。^②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对两德旅行交通方面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除德国内部贸易、无息透支贷款以及商业贷款外，联邦德国还积极通过其他经济手段来促进两德关系发展。特别是在改善两德间人员交往方面，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非商业性财政支付所起到的作用更为直接。例如，从1970年到1980年底，民主德国从联邦政府一共获得了60多亿马克的非商业性财政支付。^③其中，直接财政支付额为35.81亿马克，这笔开支主要用于支付过境费。间接财政支付为4.42亿马克，主要用于补偿民主德国向联

邦德国公民个人收取的税费。同一时期，联邦政府向民主德国支付的签证费以及通行费也达到了5.2亿马克。^④

可见，联邦德国政府经常利用经济上的施惠政策，换取民主德国在两德人员交往领域的让步。随着两德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德人员来往也日益频繁。据统计，1970年民主德国公民到联邦德国旅游人数为104.8万，1980年为155.5万，到1988年激增至674.7万。1970年联邦德国公民到民主德国旅游人数为125.4万，1980年为350万，到1988年达到555.2万。1972年，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为1.14万人，到1986年增至24.4万人。自1984年民主德国批准本国公民移居联邦德国之后，1987年移居联邦德国的人数为11459人，而1988年前11个月就达到了25135人。^⑤

两德人员交流交往日益频繁，缓解了因长期相互隔离而产生的隔阂，从而有助于维系德意志民族共同的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便是，80年代末，在民主德国国内爆发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浪潮中，民主德国公民不断高呼要求民族统一的口号——“德国，统一的祖国”“我们是一个民族”，进一步推动了德国统一的进程。此时，联邦德国科尔政府牢牢抓住历史赋予的宝贵机遇，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展开统一攻势，最终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

（三）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

自二战后德国分裂伊始，外部环境便成为阻碍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德意志两部分分属于相互对抗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这一残酷事实。由于民主德国是在苏联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且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依靠后者提供保障。因此，民主德国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其民族政策和德国政策势必会受到苏联因素的制约和

①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Stuttgart: Metzler - Poeschel , 1990 , p. 251.

②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 Reihe III/Bd. 2 , Bonn: Deutscher Bundes - Verlag , 1985 , pp. 294 ~ 295.

③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rsg.) , Handbuch DDR - Wirtschaft ,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 1985 , p. 326.

④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 Reihe II/Bd. 8 , Bonn: Deutscher Bundes - Verlag , 1983 , p. 296.

⑤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 Reihe III/Bd. 6 , Bonn: Deutscher Bundes - Verlag , 1989 , p. 545.

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对德和约,并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为此,苏联直到1954年才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在此期间,对民主德国争取民族统一的各种努力,苏联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曾多次提议就对德和约事宜进行谈判。然而,由于西方三国包括联邦德国都无法接受统一后的德国走中立化道路,双方的相关谈判都无果而终。

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开始抛出两个德国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东西方必须接受两个德国并存的这一事实。民主德国日益成为苏联抵抗西方盟国军事威胁的桥头堡,以及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随着“冷战”的全面升级,两德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的分歧愈来愈难以调和,彼此也变得更加疏远。只要“冷战”持续进行,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新统一将变得遥遥无期,只有通过国际格局的改变逐步加以实现。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陷入严重的危机:不仅国内经济、政治问题缠身,而且对外控制能力也日渐减弱,特别是,日益表现出有意放弃对东欧其他社会主义盟国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受其影响,战后德意志民族问题再次凸现。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而这一切与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有关。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外积极推行以“新思维”为纲领的外交政策。除了主动缓和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倡导全欧合作之外,苏联开始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并采取支持他们“改革”的态度。苏联对东欧盟国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标志着,苏联对其奉行已久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进行了重大修正。1989年秋,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更是以一种如释重负、毫无敌意的口

气表示,苏联允许东欧社会主义盟国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①。

与此同时,为了让国内经济尽快走出窘境,苏联更加重视与联邦德国开展经济合作,同时,对德国统一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变化。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联邦德国时,称“柏林墙”和德国的分裂并非是永恒。在双方的联合宣言中不仅提到了:“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且还隐晦的认可了每个国家完整和安全。^②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的影响下,1989年春,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政局首先发生了剧变。1989年下半年,民主德国和其他的东欧国家一样,国内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与匈牙利开放匈奥边界有着直接联系。1989年9月,匈牙利宣布开放其西部边界。同时,匈牙利也不再继续维持其盟友民主德国对在匈牙利的本国公民出境旅行的限制。因而,民主德国公民可以自由地跨越这条边界,借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自此,民主德国再次出现了大批的移民潮。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民众要求统一的呼声渐高,戈尔巴乔夫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有受到民族情绪冲击的威胁。于是,他逐渐承认了德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使民主德国民众的要求合法化。事实上,当时自顾不暇的苏联已无力向其社会主义盟友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早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后,戈尔巴乔夫就曾告诫其领导人,让他们不要指望能够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应该学会自救。^③随着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此时的经互会已呈现分崩瓦解之趋。在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看来,“迄今为止被我们视为联盟的经互会,已无法维持。我的结论是只有向西德看齐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④。可见,在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力的外部支撑后,内外交困的民主德国已无法独立应对联邦德国猛烈的统一攻势,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

① Mary Fulbrook, 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 - 2008: The Divided Nation, 3rd ed.,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 K.; Malden, MA: Wiley - Blackwell, 2009, p. 271.

② Rajendra Kumar Jain, Germany,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1949 - 1991,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3, p. 203.

③ [德]埃贡·克伦茨 《89年的秋天》,孙劲松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④ [德]汉斯·莫德罗 《起点与终点——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回忆录》,王建政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战后德国分裂时期,由于两德在统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两德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其民族政策和德国政策经历了由“一个民族一个德国”向“两个民族两个德国”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民主德国从团结全德民族力量,积极争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逐步转变为努力建立一个不同于联邦德国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和国家。通过民族划界的方式,民主德国力图进一步强化其“两个德国”政策,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与稳定。在放弃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的同时,民主德国不断地在两德人员往来方面设置障碍,并试图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培养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然而,这种简单的民族划界政策并没能维持民主德国的存在,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最终走向失败。

究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长期存在失误,不仅未能为其民族政策提供有效支撑,反而导致其最终走向消亡。由于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联邦德国,也由此逐步失去了民族统一的主导权,并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昂纳克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以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进而支撑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但事与愿违,该政策不仅加重了民主德国的经济负担,还致使其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发了

一场毁灭性的总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以及换取科尔政府的经济援助,民主德国最终被迫放弃了民族分裂主义政策,随后并入联邦德国。

其次,联邦德国的接触政策抑制了民主德国民族划界政策产生的消极影响,为日后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保留了希望。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联邦德国政府为克服德意志日益固化的分裂状态,开始全面实施“以接近求转变”的接触政策。为此,联邦德国不惜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来密切两德关系,改善两德人员交往。两德人员交往的扩大与加深,维系了日益疏远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意识。20世纪90年代初,科尔政府正是充分借助德意志人民要求统一的民族激情再次实现了德国统一。

最后,德国统一进程加速时期,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令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政策失去了强大的外部支撑。二战后,苏联作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不仅长期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也制约并影响了后者的民族政策和德国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政府为了摆脱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开始谋求加强同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为了获得后者的经济援助,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松动。“柏林墙倒塌”塌后,随着德意志人民要求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苏联最终放弃了长期奉行的两个德国政策,转为同意两德统一。内外交困的民主德国因此失去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最终以国家消亡而告终。

Changes of the GDR's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causes of its failure

WANG Chao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under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USSR, the defeated Germany was divided into the FRG and the GDR. Faced with this artificial division, the GDR initially adhered to the policy of “one nation; one Germany”. But because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way of realizing their national unity between the two Germanys, the GDR which was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FRG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banner of the national unity. In the early 1970s, the Honecker's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two-nation policy, which marked the GDR completely stepped onto the road of its national separatism.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GDR's inefficien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the penetration of the FRG's engagement policy and the dramatic policy shift towards Germany by the USSR, the GDR's policy of separatism ultimately failed.

Key words: GDR; national policy; causes of failure; German reunification

(责任编辑 伍琼华)